

STREETS & LANES OF SHAOXING

绍兴街巷

STREETS & LANES OF SHAOXING

【上册】

屠剑虹 著

绍兴市建设局 编
绍兴市城市建设档案馆

西泠印社 出版社

绍兴街巷

王永昌

上册

屠剑虹 著

绍兴市建设局 编
绍兴市城市建设档案馆

西泠印社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绍兴街巷. 上/屠剑虹著. —杭州: 西泠印社出版社,
2006. 2
ISBN 7-80735-028-8

I. 绍... II. 屠... III. 城市道路—简介—绍兴市
IV. K925.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007428号

《绍兴街巷》

顾 问： 吉振海 王张贵

编 著： 屠剑虹

摄 影： 边 伟 张 铮 屠剑虹
周 围 陈永明 宋太平

序 言

绍兴，古称越州，是一座具有2500年历史的古城，自越王句践在此建立越国都城后，绍兴经历了由小而大，由市而城，由城而盛的发展过程。至南宋建炎四年初，越州成为南宋的临时首都，公元1131年，正式改元为绍兴，升越州为绍兴府，成为当时南宋的政治、经济中心。至南宋嘉定十八年，绍兴城市的街坊已经井然有序，道路平整，河渠畅通，堤岸坚实，城墙壮观。明、清两朝，又对绍兴的街坊进行了整治，使其“经画有条”、“坦夷如砥”，曾有“天下绍兴街”的赞誉。与此同时，城内河道得以疏浚，各式桥梁遇水而跨，起伏联通；巧思迭出，造型优美。其时的绍兴城已是一座“三山万户巷盘曲，百桥千街水纵横”的典型水城。改革开放以来，绍兴的城市建设更是得到了飞速发展，道路宽畅，街景繁华，河道清澈，绿树葱郁，特别是加强了历史文化遗存保护，诸多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完善，使绍兴古城地域特点、时代特征和文化特色融于一体，城市的魅力更加凸现。

与城市同样古老，绍兴文化积淀深厚，历代名人灿若群星：有卧薪尝胆的越王句践、创建鉴湖的东汉会稽太守马臻、晋朝书圣王羲之、唐朝诗人贺知章、宋朝爱国诗人陆游、明代理学家王阳明、巾幗英雄秋瑾、学界泰斗蔡元培、文化巨匠鲁迅、革命伟人周恩来等等。绍兴名人留下了许多令后人景仰的业绩，绍兴的街巷亦留下了先人们的足迹和文化遗存。绍兴街巷的名称、绍兴街巷中流传的故事，无不与这些名人紧相维系。

《绍兴街巷》将绍兴城区百余条街巷的地名出典、历史沿革、人物故事、古景遗迹和建设状况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奉献给读者，使大家在尽情领略这座古老城市风采的同时，对绍兴城市发展的历史有更直观的印象和更深入的了解。

这次，绍兴市编著《绍兴街巷》是对绍兴地名文化的一项抢救性和保护性工作，是绍兴文化强市建设的一抹重彩。它的出版发行，将会进一步推动绍兴的历史文化研究，促进绍兴旅游事业的发展，同时，对于绍兴的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和古城保护也将大有裨益。

2005年12月

绪论

《绍兴街巷》是屠剑虹女士继《绍兴老屋》和《绍兴古桥》之后的第三部绍兴研究的著作。前面两部都是由我写的《绪论》，现在重作冯妇，也是义不容辞。使我受到鼓舞的是，尽管前面的两种对绍兴都具有重要的存史价值，为绍兴的地方文献平添了传人的积累，但这第三部，我认为不仅在科学属性上不同于《老屋》和《古桥》，而且其学术价值显然也超过以前两种。作者为此耕耘数年，确实为绍兴古城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些年来，绍兴在文化事业上有了一定的成就，除了在若干学风问题上还值得商榷以外⁽¹⁾，成绩是众所共见的。在许多出版的著作之中，绍兴的文化人，都曾投入了辛勤的劳动，但是像《老屋》、《古桥》，特别是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街巷》，是花费了巨大精力的研究成果，更是不同凡响的。

一部著作，卷首往往有《序》，有时也有《绪论》。我因为曾主持过一个外文翻译组，自己也译校出版过一些外文著作，并且多次到国外讲学，毕生与外文打交道的机会不少，所以在文字上往往要作中外对比的考虑。“序”，在英文中可以译作 preface，也可以译作 introduction，但是“绪论”同样也可以作这两种译法。其实，preface 和 introduction 这两个词汇，意义并不完全相同，而我的这篇《绪论》，可以认为既不是 preface，也不是 introduction，因为读者中必然有精通外语的，所以有必要作一点说明。我的这篇置于全书之首的拉杂文章，其实是一种 review，正是因为这种原因，所以事前先按眼下通例说明一句：“文责自负”。

一

前面已经提及，本书著者往年出版的《老屋》和《古桥》二书都是由我写《绪论》，其实我对这两个主题都没有研究，无非因为我是一个绍兴人，又多活了几岁年纪，稍稍懂得一点家乡的掌故而已。但现在的这部著作却不同，也就是我开头就提到的“科学属性”。《绍

兴街巷》是一种城市历史地理研究，而我恰恰也是一个历史地理学者，此书正是撞到我的专业上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领域很宽广，凡是现代地理学研究的门类，也都有历史地理学的一份。从现代人文地理学来说，城市地理学是一个热门。历史地理学也是如此。我在这个门类中写过不少文章，也出版过一些专著和译著，例如《中国六大古都》⁽²⁾、《中国七大古都》⁽³⁾、《中国历史名城》⁽⁴⁾、《中国都城辞典》⁽⁵⁾等。美国著名汉学家施坚雅⁽⁶⁾主编的一部中国城市历史地理名著——《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⁷⁾，也由我组织翻译，并担任校者和写了长篇《后记》⁽⁸⁾。当然，我对这门学科虽有兴趣却并不精深。记得在1995年，马正林教授以他在大学执教这门课程二十余年的经验写成一部高等学校教材《中国城市历史地理》⁽⁹⁾，并且索《序》于我。当时正值我应美国和加拿大许多大学之邀准备出国的前夕，由于这次出国的时间估计在半年以上，所以只好在临行之际仓卒作《序》，文字虽长，但内容自感不足。却不料在其书出版时读到了他在《后记》中的谬赞：

“杭州大学陈桥驿终身教授在百忙中为本书撰写了精彩的序言，阐明了中国城市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和基本规律，不仅使本书大为增色，而且也使中国城市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有了基本的方向，可以说是中国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指导性论述。”

“指导性论述”的话我当然是承受不起的，不过由于从上世纪80年代之初起，我经常出国讲学，懂得一些国际学术界研究的行情，另外，我自己的讲题中也常常涉及于此。例如我在日本广岛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期间，曾经讲过“比较城市地理学研究”的课程，并且与这门学科的同行有过较多的交往。我在国立大阪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一学期以后，曾经写过一篇《日本学者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拙文⁽¹⁰⁾，其中提到：“历史城市地理研究或许是日本学者在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成果最多和最富于创造性的部门。”我在该文中举的例子，都是日本学者对中国历史城市研究的成果。他们当然也研究自己本国的城市，记得那年在关西大学大学院（研究生院）担任客座教授，因为讲的课程是《水经注研究》，《水经注》记叙的城市很多，例如卷十六《穀水注》记叙的洛阳，内容确实相当详细，我因此也注意了一下日本学者笔下的他们本国的历史城市。让我感到印象至深的是，他们的研究已经详细到对历史上某些城市作逐街逐坊的研究，这实在是我们的城市历史地理所尚未到达的研究水平。此后，我又发现他们对中国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也开始深入到城市内部的分区，这就是斯波义信的《宋都杭州的城市生态》。当时，我在大阪大学讲学，我们夫妇住在该校专家楼，但我的办公室恰与斯波教授比邻。斯波是我在学术上的好友，此文刚刚发表在大阪大学文学部的《共同研究论集》上，他是一位谦虚谨慎的学者，深恐文内有什么不妥之处，因为知道我是在杭州执教多年的所谓“老杭州”，于是几次与我商榷此文是否存在问题。其时我在杭州高校执教确已三十多年，但对于这座城市的历史研究其实还很肤浅。读了他的

文章，让我很受启发，就与我夫人胡德芬商量，请她在专家楼翻译此文，凡有疑难之处，可以随时向他请教。此文译成后发表在《历史地理》第六辑⁽¹¹⁾。全文的主要内容是把南宋杭州进行生态分区。他用六幅考证精详的示意图，把作为南宋首都的杭州，分成官绅区、军营区、补给区、经济中心区四区，清楚地勾划出各区的界线，并在图上标志了全城的主要宫观寺院和娱乐设施（瓦子、官酒库等）。当然，斯波对中国的城市历史研究，还有超过杭州的作品⁽¹²⁾，但从对杭州生态分区的这种精深研究来说，我这位“老杭州”实在感到惭愧。所以当读到《绍兴街巷》这部书稿时，确实嘘了一口气，我们的城市历史研究，终于也深入到街巷了。

二

记得1979年春夏之交，绍兴市（当时还是辖境不大的小市）邀请我到市府作一次关于绍兴历史发展的报告，因为自从“文革”以来，这类活动已经多年绝迹了。当时，市府的不少领导也都出席听讲。十分讽刺的是，我一到绍兴，就看到府河正在填塞，山阴大街（解放路）和会稽大街（后街）行将合二为一。为此，我在报告中特地强调了山阴和会稽之间的这条府河，讲述了这条城内河流的渊源和重要性。那次我在绍兴多留了一天，向一些熟悉的人大声疾呼。回到杭州以后，又为在绍兴发生的这件咄咄怪事大声疾呼。这是因为教授头上没有乌纱帽，没有什么需要顾虑的事。记得后来有人与我谈起，我当时的呼吁可能得到一些效果。据说大云桥以南的沿河步行街，或许就是这样留下来的，因为按照计划，府河要全部填废，一直填到南门。这也很可能是与我说话者自己的猜测和对我的安慰。

时隔一年（1980），由于中国的闭关锁国缓解，国外的一些长期研究中国的汉学家，迫不及待地相继到中国访问考察。当时，美国斯坦福大学著名汉学家施坚雅教授，正继费正清（J·K·Fairbank）之后，成为国际汉学家之首，他在斯坦福大学建有一所“宁绍研究室”，专门从事这个地区的研究。他率领十几位专家教授，从北京到杭州，省里指定我作为他们的陪同者前往绍兴和宁波。当时，绍兴还没有一家可以接待外宾的宾馆，代表团就住在市府交际处（今绍兴饭店）。由于当官的还没有“知识化”，外办主任用一口地道的绍兴土话介绍这个城市。从北京跟来的一位担任翻译的女士即席拂袖离座，拒绝为她完全听不懂的话作翻译。于是，我就不得已兼了翻译的任务（从此到宁波一直如此）。一个上午，听了这位外办主任结结巴巴的诸如“打鑼箔”、“做老酒”之类的介绍以后，这天下午，代表团就摊开随带而来的几种绍兴城市地图（有清代的，也有民国的），准备选择几条街道作一次踏勘。代表团中，除了施坚雅与我已经有过多次通信和著作互赠而一见如故以外（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没有语言隔阂），其余的我都不认识，但知道他们之中也有来自耶鲁和加州等

大学的，其中还有一位唯一来自伦敦经济学院的英国人。起初，我以为他们都是研究宁绍地区的。但在摊开地图研究踏勘路线以前，代表团中独一无二的斯坦福大学女教授张富美，把我拉到墙角与我轻声说话，她祖籍宁波，但自幼生长在台湾，是早年从台湾去美国的，所以说的也是英语。她说：这些人中间有几位“宋史热”，要我尽可能避免引导他们看宋代遗迹，否则他们会逗留不走，影响大家的考察。这事易办，因为当时沈园尚未开放，而我还可留意，不把《嘉泰志》和《宝庆续志》已经出现的街坊名称告诉他们。

当我在他们带来的城区衢路图上作简单说明时，让他们最感诧异的是府河的填废和山、会两条大街的合并工程。而且正因为此，他们宁愿把诸如鲁迅纪念馆和府山等放在后面，而第一站就去看清道桥。斯坦福大学宁绍研究室的几位，虽然谁都没有到过绍兴，但对于这张城市地图似乎比我更为熟悉，十几个洋人站在已经夷平的清道桥两边指手划脚。由于当时外国人来得很少，市民围观“洋鬼子”的圈子很快形成，我们的活动范围和视界变得很小。而正因为此，不仅是他们与我的谈话，他们彼此间的议论，我都能听得清楚。他们谈话总的倾向是对古城的这种变迁感到惋惜和不理解。施坚雅作为领队人，说话是稳重而有礼貌的。他告诉我，他对这种变化感到很可惜，但这毕竟是绍兴人自己的事，代表团不会公开对这类事发表任何意见。但其他几位就不同了，有一位问我：“你们的文化革命是不是全停了，包括绍兴？”开始我并不完全理解他的问题，后来才考虑到，他显然以为“文革”叫停，全国各地存在差异，绍兴古城的这种填河拆街工程，或许还是“文革”的一部分，是“破四旧”的延续。我还听到他们之间的相互交谈，有好几位都摇头摊臂，这是美国人对某一件事感到莫名其妙和无可奈何时的常用动作。

这就是我可以回忆的当年这个美国代表团对这项鲁莽工程的态度。当然，他们是从一个讲礼貌的国家里来的，讲话是克制的，尽管对此深为诧异，甚至认为是“文革”的延续，但如施坚雅所说，这是绍兴自己的事。尽管他心里充分明白，真正的绍兴老百姓，是既管不着府河，也管不着山、会这两条大街的。不过现在的情况已不同于当年了，中国人对这类事已经有了一些发言的自由，而且说话也变得很尖锐了。

三

绍兴及其附近被西方人称为“威尼斯”，据我所查到的资料，最早出于法国旅行家格罗赛，他在18世纪末描述绍兴城：“它位于宽广和肥沃的平原之中，被水所环绕，仿佛就是威尼斯。”⁽¹³⁾其实，绍兴古城不仅被水所环绕，城内也是河港纵横。明王守仁（阳明）所撰的《浚河记》⁽¹⁴⁾一文，曾经记叙了这条山、会二县间的府河：“越人以舟楫为舆马，滨河而廛者皆巨室也。”说明在15—16世纪，山阴大街和会稽大街都还是面临府河的单面街，如同上世

纪50年代的柯桥、东浦、安昌等集镇的格局一样。清初蒋士铨也撰文记叙过这条府河：“越郡为泽国，城中河流纵横，界划若棋局，其阔处可并三艇，……自昌安门入，由斜桥至小江桥数十户为城河孔道，两岸列市肆，货船填集，载者卸者鳞鳞然，而舟往来如激箭。”⁽¹⁵⁾蒋士铨是乾隆进士，以他所见，说明直到公元18世纪后期，山、会两县沿府河的单面街还局部存在。山阴大街和会稽大街这两条沿河单面街消失，也就是山阴大街东缘，会稽大街西缘，沿河屋舍栉比的现象，是乾隆以后发生的。不过这种情况在当时仅出现于山、会这两条单面街，并不殃及这座古老水城的纵横河港。我在拙作《绍兴水环境的严峻现实必须改变》⁽¹⁶⁾一文中曾经作过调查：在1949年以前，城内有能够通行舟楫的大小河港32条，计长35公里；在这以后的50年中，共填废了其中的17条，计长17.2公里。所以在这50年中填废的城内河港，在数量和长度两方面，都已超过或接近1949年的一半。我在此文中曾经提出古城内废街还河的建议：

“现在暂还不能想像把填废的17公里河港全部恢复，但是诸如70年代填废的这条贯穿前山阴和会稽二县县界的府河，实在是应该首先考虑的大事。假使让府河恢复，山阴大街和会稽大街都成为沿河的水城单面街，而府河经过渠化和沿河绿化，成为一条纵贯这两条单面街之间的城市绿带。这样，绍兴将成为一个特色鲜明的真正水城，这是何等诱人的前景。当然，城内的废街还河还需要通过商业区和住宅区的再规划、住宅区的适当高层化（包括对应该保留的老街、老屋的考虑）以及开发近、远郊区等措施而次第实现。”

当然，在最近十年之中，绍兴的水环境是颇有改善的。最令人鼓舞的是环城河的整治和运河园的建设。环城河其实是浙东古运河的一部分，现在已经成为这座古城的一种胜景。而运河园的建设，汇集浙东古运河的文化精华，博得了我国南北大运河沿线各地的高度赞赏和极大关注，成为当今沿运城镇规复运河文化的榜样，这些都是这座古城在水文化重建中值得推崇的成绩。

四

从我的少年时代到青年时代，现今的广场原来是山阴大街的热闹区段。大门旁街，内有建于南朝梁天监年代（公元6世纪）的大善寺和大善塔。而大门内与寺、塔之间有一片广场，情况颇类似老北京的天桥和南京的夫子庙，里面有茶座、摊贩和玩杂耍的，特别是进门左侧卖一折七扣书的锦文堂书店，这是对我极有吸引力的地方。溯昔抚今，让我这个老顽固实在无法理解眼下的格局场面。大善寺没有了，十五个世纪以前的大善塔被一群形形色式不伦不类的现代建筑包围掩盖着，显然是这一大片现代化“广场”中的累赘。我没有花过国家一分钱的外汇到国外作过“考察”，但是由于应邀讲学，也算是一个多次走出国境，

稍稍见过一点世面的人，也见过外间世界的不少广场。例如纽约的“时报广场”，名气很大而面积其实很小。我并不了解这个广场的形成过程，但从它的周围环境观察，当年恐怕没有什么“拆迁户”，也不必在地图上抹去原来的地名。也有一些建有大广场的城市，我所到过的如巴西的首都巴西利亚。但这个城市里的广场是和城市同时在这个国家的几何中心的草原上新建的，上世纪50年代后期，地图上才有这个城市，在这以前，这里是一片荒无人烟的草原。但是按我的回忆，那里的几片广场，总统府面前的一片或许最大，与绍兴的这片在公元六世纪就有寺、塔建筑的“广场”相比，其面积也不过伯仲之间而已。

我还想把我今年发表的《旅行·旅游·旅游业》^{〔7〕}一文中的几句话在此重录一段：“‘文革’既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破坏，也是世乏前例的大破坏（在和平环境中）。破坏既已成为事实，也就不必赘议了。问题是，对于我们的旅游资源来说，改革开放以后的这二十年中，在古城保护方面也有值得我们反思和应当吸取教训的地方。在这方面，我自己的老家就是现成的例子。我的老家是明隆庆五年（1571）状元张元忭的府第，清嘉庆年代，张氏后代把整座府第卖给了我们。所以我从出生到念高中，一直住在这座明朝状元的府第之中。不说别的建筑，仅后园中的一棵樟树，在我十三四岁念初中时，要年龄相仿的三位堂兄弟才能合抱。而我祖父说，在他童年时，这棵樟树就有这样粗大了。说明在张元忭兴建府第以前，樟树可能已经存在，则在它被砍伐前，树龄当已超过五百年。但这座古老宽敞的状元府第，以一纸‘红头文件’于1992年被全部夷为平地。府第所在的这条街称为车水坊（改革开放以后称为人民路），街长大约三百米，两端各有一座高大而雕刻精致的石牌坊。而府第大门口，作为旗杆的基盘、础石和石碑，在我离开老家到内地求学时都还完好存在。上世纪末，绍兴城建档案馆馆长屠剑虹女士编撰《绍兴老屋》巨著，嘱我写作此书的《绪论》，我已在其中把这座府第的宏伟外观和精致结构作了回忆记叙。在这短短二十年中，全国范围内，不知有多少古老而有价值的民居宅第（当然也是旅游资源）化为乌有……”

上列一段中的情况在这二十多年中当然不只是发生在绍兴，所以我在上述拙文中也批评了其它地方的一些“杰作”。

五

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的进步，这是当前世界上都存在的事实，我们无非因为在“以阶段斗争为纲”的禁锢下，做了几十年诸如“大炼钢铁”、“大办食堂”、“上山下乡”以至“文化大革命”等的愚蠢游戏，而让我们的进步延误了许多年，现在确实应该快马加鞭，迎头赶上，争回我们在那个愚蠢时代中损失的时间。但我们也必须充分认识，发展经济和建设城市是不能在破坏城市传统文化的行为上进行的。绍兴不是巴西的巴西利亚，也不是澳洲

的堪培拉，它是一座已有2500年历史的文化古城。我到过国外的不少著名城市，也到过国内的诸如香港和台湾的一些城市，那里也发展经济，也从事城市建设，却没有破坏已经存在的文化。尽管比比绍兴，那些城市的文化要浅薄得多。例如美国的旧金山，到过那里的人一定会知道市中心有一条称为Lombard的街道，是一条著名的“湾街”，街道是不宽的单行线，在大约150米的街段中，有8处大湾，湾度从六七十度到近于九十度。但是他们从不想到要截湾取直，更不会把这条街道从地图上抹去。相反，Lombard倒是成了旧金山的一景，凡是初到那个城市的人，都想到这条老街去看看。今年9月13日的《联谊报》上有一篇署《政协视线》栏目组的头版文章，文题作《老街之痛》。内容是写杭州的老街，写了不少老街风貌的丧失和保护困难。全文的最后一句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相关的职能部门要负起责任来，这是个历史责任。”此文中所说的“相关的职能部门”，这类“职能部门”里面的成员，多半都是戴有不同名目的乌纱帽的，都是有权拿国家的外汇出去“考察”的，尽管这中间有许多人根本不懂外语，但是他们都有眼睛，Lombard的这条“湾街”就是可以凭眼睛“考察”到的。范围不大的“时报广场”也是可以用眼睛“考察”到的。

我从小生长行走的这条称为“车水坊”的小街曾经有好几位熟人先后与我谈及：你们的那条小街已经建成“金融一条街”了，是绍兴的“华尔街”呢！在地图上抹掉车水坊这个地名我毫无意见，在市场经济的体制下，发展金融业是势所必然，我当然拥护，但把绍兴的“华尔街”放在这条街段上，我认为是一件咄咄怪事。“华尔街”是美国纽约的金融街，所以名闻天下。此街位于纽约闹市区曼哈顿一端，我曾经步行走过这条长不过600米的不宽街段。最初来到这里的是荷兰移民，他们曾于17世纪中期在这里建造过一条高不过3米稍多的墙垣，但到那个世纪之末，后来的英国移民，就推倒荷兰人的墙垣而成为一条街道，所以称为“华尔街”，“华尔”(wall)就是墙垣的意思。后来，随着曼哈顿地区的发展，许多金融机构在这条街上建立起来，“华尔街”就成为举世闻名的金融街。这是一条没有历史文化的街道，英国移民在此建街之时，这里唯一称得上“文化”的东西，就是比英国人早到五十年的荷兰人所建的一条低矮的墙垣。而这条绍兴的“华尔街”是付出了多少历史文化的代价兴建起来的呢？现在，国内有不少城市都在近郊或远郊建立所谓“经济开发区”，绍兴的“华尔街”难道不能兴建到那些地方去吗？

对于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这里的官员和平头百姓，都比一般城市肩负重大的责任。所以最后还想举个例子，记得我80岁那年(2002)，还应“日本国际文化研究中心”之邀，偕夫人到那里开会、访问、讲学，在京都市住了十多天。自从上世纪80年代之初起，先后在京都住过较长时间，后来由于年事渐高，已经十年没有去到这个城市了。但这次旧地重游，看不出它有什么变化。我三十多年前初到那里的所有街巷都照样存在。特别是往年我为《绍

兴桥文化》⁽¹⁸⁾一书所写的《序》中记叙的：“市内的许多小河，都以鸭川和桂川为水源。这些小河，河床不深，水清见底。”也都照样不变。而沿街仍是宫殿、寺院、神社和其他不少小型的祭祀设施。尽管那几年是日本经济不景气的年代，但市容也仍然是行人熙攘，车辆喧闹，由于社会保障系统的完善，街坊安谧，人际交往还是彬彬有礼。京都（平安京）到公元8世纪末才成为日本首都，历史比绍兴古城要晚得多。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历史文化古迹的保护直到今天水环境的保护等方面，包括上面引及的《老街之痛》一文中所触及的不少问题，都有我们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当然，这几年绍兴在古城保护方面已做了不少工作，特别是加强了对仓桥直街历史街区、西小河历史街区、书圣故里历史街区、八字桥历史街区等七个历史街区的历史文化遗存保护，使人们看到了古城的魅力得以逐步恢复的希望。

由于《绍兴街巷》这部书稿，引出了我的这许多拉杂的议论，最后总还得回到此书的本题上来。我在此文开头就指出了此书的重要价值，现在再归纳几句，从学术上说，这是我国城市历史地理研究引入到街巷考证的创举。作者把当今的150条街巷作了详细的记叙，并且还把已经在地图上消失的111条街巷作了《附录》。作者是用和盘托出的方法从事此书写作的，这是一种客观的态度，也是一种科学的态度。作者在这个课题的研究中历尽艰辛，但正是由于上述写作方法和治学态度，使此书除了在城市历史地理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以外，还大大提高了它在存史、教化、资治方面的实用价值。这是因为绍兴是一座渊源古老的历史文化名城，它在这些年代中的经历，对全国许多经历相似的城市都具有重要意义。

2005年11月于浙江大学

注：

(1)我曾在《学术界》2004年第5期发表过一篇《论学术腐败》的长文，阐述了这50多年来的种种学术腐败现象及其原因。绍兴学术界尚少见这类事例。但也有值得商榷的，例如，我读到若干绍兴学者的文章引用顾颉刚的《古史辨》，而且写明出版社和出版年代。但有人告诉我，这些学者其实都没有此书，整个绍兴也很难找到此书，则他们怎能这样引用此书呢？这属于一种做学问的不老实现象，值得引起注意。

(2)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出版。

(3)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出版。

(4)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出版。

(5)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

(6)G.W.Skinner，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著名汉学家。

(7)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7年出版。中译本，叶光庭等译，陈桥驿校，中华书局2000年出版，2002年再版。

(8)原为《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发表于《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新华文摘》于此年第8期转载，此书中译本出版时，移作《后记》。

(9)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

(10)《历史地理》第6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

(11)同上。

(12)指《宁波及其腹地》(Ningpo and Its Hinterland)，收入于《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施坚雅在《导言》中称赞此文：“斯波关于宁波城市的经济描述，在现有叙述中国城市的英语著作中，很可能是最完备的一种了。”我在中译本《后记》中也指出：“在我所见到的有关宁波城市研究的中文著作中，像斯波这样的论文也是凤毛麟角的。”

(13)Grosier, Description de la chine, Nagel's Encyclopedia Guide, Vol, Z, pp.1090.

(14)《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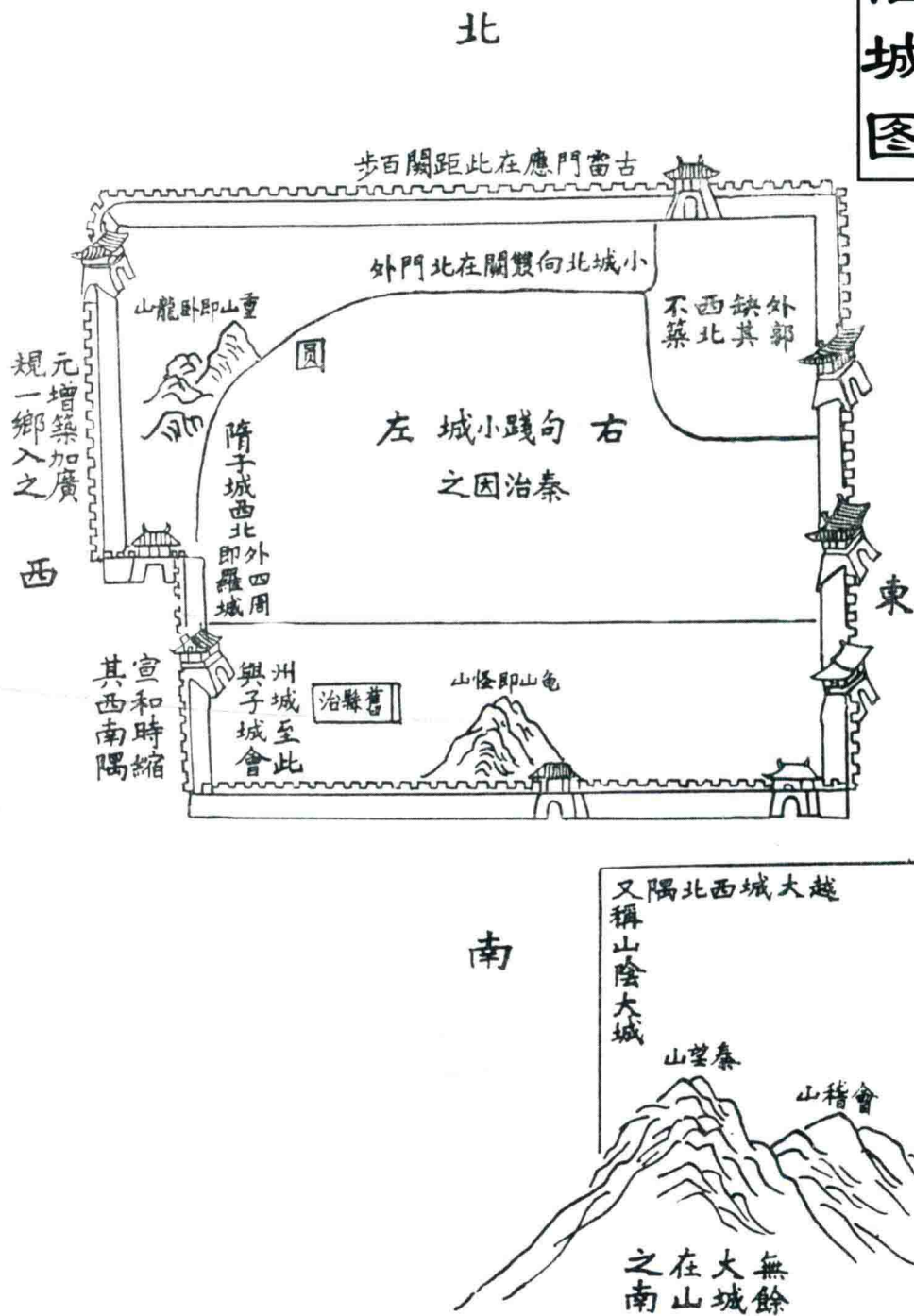
(15)《忠雅堂文集》卷八。

(16)李永鑫、张伟波主编《越文化研究文集》，中华书局，2001年出版。

(17)《文化旅游》，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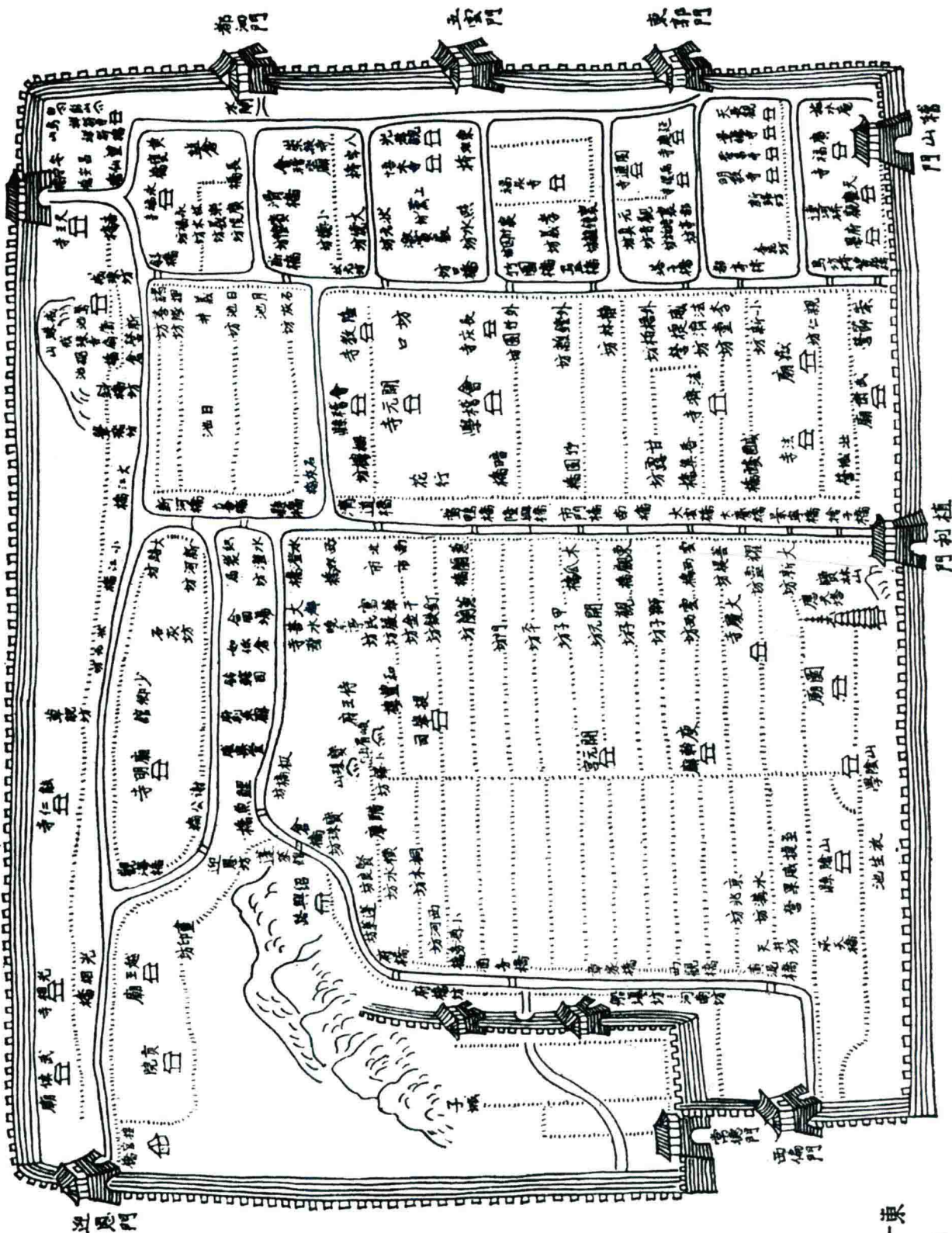
(18)交通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

旧城图



嘉庆山阴县志卷五图

舊越城圖



北
西
東
南

